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 不知道下一个谁“进去”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假球和黑哨消灭了真实比赛，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真实的比赛似乎不再存在了。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南勇、杨一民，中国足球的两名“资深官员”，从被传接受调查，到证实已被传讯，再到被撤销职务，进展神速。这些只是外在的迹象，而南勇、杨一民具体涉嫌何事，调查进展如何，仍属侦办秘密。

从一些小俱乐部、小人物开始，中国足球黑幕逐渐揭开，至南勇、杨一民到案，总算有了一点紧抓不放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是否仍将有人“进去”，我们不知道中国足球十多年职业化进程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是否都会被清算，而只能说，如果南勇和杨一民是预定的顶头，而十多年职业化进程中神神鬼鬼的东西不能全被清算，那么隐秘的污秽就会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天空埋设一些阴霾。

不知该如何解读中国足球乱状的意义，这是一个特殊的腐败领域，还是权力兑换利益、事业变身黑洞的一个普通剪影？

我们确实很少看到像足球这样全局性而又近乎公开地掠夺社

会资源、蔑视社会反应、愚弄全体民众、操纵结果走向的领域。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假球和黑哨消灭了真实比赛，至少在人们的心目中，真实的比赛似乎不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从单场比赛到年度结果，都在人们心目中定性为交易和操弄，从足协、俱乐部、教练到球员，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操盘手。比赛成了一种表演，人们的眼睛被派作新的用途，那就是为虚假的比赛作真实性见证，以使幕后交易变得合法。

就这样，中国的足球，国家管理的一个公共领域，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把头控制的山寨，大大小小的把头利益纠合而又有纷争，使人们见到“足球”二字，立即想到黑暗、混乱、内幕交易，而不是想到竞技的阳光、健康和纯净，更不会想到公共领域的开放、公平和秩序。这是一个全盘颠覆的领域。

也许，相对开放的舆论，促成了人们对事物本来状况的认识。足球与娱乐，大概有最开放的舆论。娱乐几乎是纯粹的私人生活，而足球不仅涉及到人们的个人兴趣，而且具有明显的公共生活特征。娱乐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人们更多地只对明星个人产生意见；而足球被搞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就不只是对球员产生意

见，而且要理所当然地去判断球队、俱乐部、足球协会等组织的作用。

体育是一项社会事业，在中国，这项社会事业不是运动员和足球协会的自治领域，而是国家权力高度介入的管理对象。哪怕是自治领域，社会仍然有权要求一项社会事业的阳光与公正，而作为权力管理的对象，人们更有理由据之判断权力的性状。这就是说，如果足协是真正的社会协会、自我管理领域，那么人们要求的是这一社会组织的合法与规范；如果足协是公权力的管理领域，那么人们就必然由此去映射国家权力体制的好坏。

十足的悲剧，或许也是十足的必然，中国足球在权力深深介入之下，变成了一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演示场。足协其实是国家体育的“足球管理中心”，其主席已经被俗称为“掌门”，阎掌门、谢掌门、南掌门，掌门来掌去，如同“帮会”一样。掌门并不受俱乐部的制约，也不会有球员工会与之抗争，足球管理中心或者足协，奇怪的一身二任，却又是常见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亦官亦民，亦管理者亦市场主体，既是权力场又不处社会关键位置，形成一种特殊的权力边缘圈子。这个圈子既完全依照权力规则运行，又比

中心权力领域更容易不被作为权力看待，从而方便地游离于官场与市场之间。

正是因为足坛未被视为正式的官场，这才有了舆论的相对开放，从而也使人们很早就看到其间的混乱。但也正是因为它未被视为正式的官场，而只被看作是一个行业风气问题，从而使病状肆无忌惮地展现。一个公然招摇的腐败领域就此出现在人们面前。

如果舆论公开能够更加充分一些，那么人们将发现更多领域的整体性混乱。所以，我们还很难说足球的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我们只能说，舆论的公开，可以使人们发现社会的真实，但社会状况并非舆论所制造，也非舆论就可以改变。足球问题有舆论反应，但如果一种权力不受约束，那它是不会从根本上在意舆论的，这就是“舆论监督”的限度。

足球黑幕当然要一揭到底。但客观说，一场足球健康化运动也只能用于迅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足以使未来不重复历史。

刘洪波

(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



(上期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

## 名嘴同期声

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



“自行车如果一旦停下来，就会倒，自行车只有在动的时候，它才是平衡的，站立的，才是有活力的。”

——在白岩松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像自行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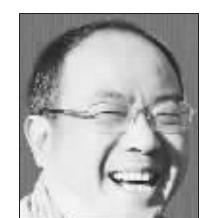
“很多农村学校连窗户上的玻璃都没有，那些孩子怎么登录你们的网站？”

——教育部要求全国的学生上网“给祖国母亲拜大年”，孟非认为此举很可能伤害一些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渣土车问题表扬过多，人们就会觉得有些虚假。”

——东升说的“这种情况”是：渣土车在闹市区横冲直撞、闯信号灯，在城郊接合部抛洒滴漏等现象仍然存在。



“我觉得校长不要叫校长，最好叫店长，或者叫总经理比较合适。”

——老吴认为现在办教育的人常常像商人在开店，心思都放在抢生源抢家长的钱上了。

## 是否献爱心是一道“选择题”

回应《爱心淮阴 我们为什么“被献爱心”》(1月17日柒周刊06~07版)

善是一种无形胜有形的力量，行善是一种让人感到愉悦的行为，理应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行动，绝对不能也不应该搞简单化、一刀切。在行善的问题上，有关部门，应该少让老百姓

做“必答题”，多让老百姓做“选择题”，作为一个公民，遭遇“被献爱心”的时候，应该有说“不”的权利，这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南通 张卫斌)

## 瞒报猛于虎

回应《普钢死亡名单背后从瞒报到不报》(1月17日柒周刊04~05版)

事故发生的前一天，同一地点也曾发生煤气泄漏，这一事实武安瞒报事件的通报中，至今未见披露。事故发生后不积极做好善后工作，反而采取瞒报手段敷衍了事，简直就是把工人

生命当儿戏。如果第一次事故发生后，企业如实上报，采取措施，及时整顿，后面更大的伤亡事故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教训是深刻的，瞒报猛于虎！

(盐城 威思权)

## “唯论文论”助长学术造假

回应《谁在异化SCI》(1月17日柒周刊08版)

读硕、读博，没论文就毕不了业。如果这个人没有写论文的能力，而他又想拿文凭，你让他怎么办？逼着公鸡下蛋，只好去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一名医生医术再高明，如果没发表论文职

称就评不上，而那些医术平平，擅长东抄西拼的人倒可以轻松过关。这说明学术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唯论文论”既没能真实反映某个领域的学术水平，也助长了学术造假。

(南京 汪庆国)

## “花木栏”让政府丢面子

回应《“花木栏”来去匆匆，政府决策太随意》(1月17日柒周刊13版)

如果说“花木栏”来去匆匆是个例是偶然，那么“拉链路”的不断诞生却是寻常事。公众一方面感受到出行不便，另一方面则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深感痛惜。我们不禁要问：相关部门的决策真

备前瞻性吗？是慎重、缜密、科学的吗？行政主管部门有足够的协调和领导能力吗？而听取大众的意见和建议，把纳税人的钱花到刀刃上，是政府应该做到和必须做到的！

(南京 张殿恩)

## 直接引语

Voice and Opinion

“公民最大的责任是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监督政府为全体公民服务。”

——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修改“拆迁条例”的北大五学者之一的姜明安认为，法治国家必须靠每个公民去建设。

“老子孔子打架你帮谁？”

——清华大学在上海自主招生面试时的考题之一。

“我们看到一个特别黄的节目是王璐瑶主持的，演员是在歌厅找的，有点像三级片。”

——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主任金文雄抨击部分主持人主持风格低俗。

“在夫妻办理准生证的时候，就应该设置一个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的考核或考试，不达标就缓发准生证！”

——重庆政协委员王小波在其提交的提案中建议对道德考核不合格的夫妻缓发准生证。

“中国人会交流的太少。”

——著名外交官吴建民称，在外事活动中有的中国官员心态封闭，不接受媒体提问；有的甚至不具备“直视对方”的基本礼仪。

“这些年，中国教育的德行，怕是越来越接近中国足球了。”

——易中天撰文针对“10万代课老师被清退”的传闻表达异议。

“德国对以色列的生存和未来负有历史责任。”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她看到自己已经在大选中失败，所以建议我与她辩论，在那种肮脏的谎言中与其竞争。”

——在乌克兰第一轮总统大选投票中占领先的亚努科维奇拒绝与进入第二轮选举的总理季莫申科举行电视辩论。

“世界将变得非常糟糕，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拉登的儿子奥马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对美国来说，拉登活着比死了要好。

“如果他们做了针对我们的事，那么这些军舰将成为伊朗军事行动的最佳目标。”

——伊朗国防部长瓦希迪称，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袭击，那么西方国家将会遭到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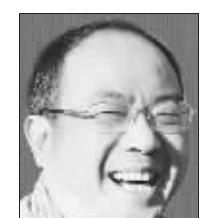
## 孟非零距离

Dong Sheng's studio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渣土车问题表扬过多，人们就会觉得有些虚假。”

——东升说的“这种情况”是：渣土车在闹市区横冲直撞、闯信号灯，在城郊接合部抛洒滴漏等现象仍然存在。



“我觉得校长不要叫校长，最好叫店长，或者叫总经理比较合适。”

——老吴认为现在办教育的人常常像商人在开店，心思都放在抢生源抢家长的钱上了。

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

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您的看法和对“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阅读反馈，200字以内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E-mail:njmengqiu@163.com